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陈学明 吴晓明 /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 丛书副主编

批判理论视阈中的 协商民主

贺 菱 / 著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e Context of Critical Theory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陈学明 吴晓明 /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 丛书副主编

批判理论视阈中的 协商民主

贺 菱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理论视阈中的协商民主 / 贺羨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7.1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229-11546-3

I. ①批… II. ①贺… III. ①民主协商—研究
IV. ①D0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157号

批判理论视阈中的协商民主

PIPAN LILUN SHIYU ZHONG DE XIESHANG MINZHU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贺 羨 著

丛 书 主 编 陈学明 吴晓明

丛书副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责任编辑:徐 飞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刘 倩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0.5 字数:160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546-3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 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 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 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 年,全国又建立了 21 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 2004 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

2 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

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续总序

这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早在 10 年前就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前后共出版了近 20 部书，由俞吾金教授任主编，陈学明、吴晓明任副主编。当今天再次筹划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时，俞吾金教授已逝世一年多，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俞吾金教授在“总序”中已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特点，以及对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仅做若干补充。

与 10 年前相比，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刻认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明确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二级学科。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二级学科，而主要是通过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体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流传进我们中国的。中国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译介和研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从 21 世纪初至现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实践中，先前的思想障碍逐渐被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要求出现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意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成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20世纪末到现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某种对照性的理论资源,既为论证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理论说明,也为破解中国道路面临的难题提供借鉴性的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因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显学。我们这套丛书的价值与意义是同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清醒地知道,一套丛书的命运固然主要是取决于社会对其需求的程度,但同时也离不开这套丛书自身的品质。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使这套丛书的品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我们打算做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

其一,原先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或者某种思潮、某种流派,现在我们力图强化“问题意识”,在继续推出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的著作的同时,着重出版以问题为导向的著作。

其二,原先我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扩展视野,把更多的思想家包含进来。具体地说,本丛书所涉及的国外思想家将包括“三个圆圈”:“核心的圆圈”还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再扩展到那些并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国外左翼学者;最后再往外扩展到那些

2 “左翼”以外的学者,只要他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就将成为我们的

研究对象。

其三,原先本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我们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以及在这里就读的博士生,现在我们将本丛书扩展成整个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丛书,热忱地欢迎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出版。

其四,原先本丛书的著作基本上是以“述介”为主,即主要是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把其讲清楚。现在我们提倡在走进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从研究对象中走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做出深刻的研究,本丛书还会继续出版“述介”型的著作,但将更加重视“研究”型的著作。

最后,我们在此对重庆出版集团致以谢意。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重庆出版集团是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早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们就支持徐崇温教授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当时作为青年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该丛书的写作和出版。我们所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名著提要》(三卷本),作为该丛书的一个部分,在上海推出时,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亲自参加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重庆出版集团所做的工作。近30年时间过去了,重庆出版集团不改初衷,继续竭全力支持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在与我们商谈出版这套丛书时,根本不与我们涉及当前出版图书通常所见的那种所谓“出版贴补”之类,这着实使我们感动。这使我们在重新策划这套丛书时,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希望以交出更多的优秀著作来回馈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陈学明 吴晓明

前言

协商民主是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民主形态,它是在反思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代议制民主所遭遇的新时代挑战的应答。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跟踪研究和反思有其必要性,它不仅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也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批判理论家在协商民主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由协商民主的内在反思性决定的。马尔库塞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启发哈贝马斯认识到德国战后民主困境的症结所在,促使其构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取代议会民主,即协商民主;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为协商民主提供了规范基础。此后的协商民主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代的代表是哈贝马斯,他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在其理论构建中,协商民主、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相互支撑,其中公共领域至关重要,它既为协商民主提供合法性来源,又为交往理性提供平台。第二代的代表是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艾里斯·扬(Iris Young)、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他们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学界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了诸多批评,本哈比和扬在为后者辩护的基础上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提出“多元”是其关键特征。弗雷泽首次区分了“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接受

这一观点,对早期理论做了部分修正。针对协商民主缺乏效率的批评,博曼试图结合协商民主与议会民主的优势,兼顾少数与多数的利益。第三代的代表是瓦尔特·巴伯(Walter F. Baber)、罗伯特·巴莱特(Robert V. Bartlett)和黛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倾向于把协商民主当作一种社会运动。他们试图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调和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探索一种新的协商模式,并且初步取得成效。波尔塔在“欧洲民主与社会动员”研究中,运用了一种横跨(根据赋权、包容和平等的程度的)参与和(涉及决策模型和交流质量的)协商维度的类型学,提供了协商民主效用的评估范式。

他们既是协商民主理论家,又是批判理论家,他们的协商民主研究以反思和重构为主,带有浓重的批判理论色彩。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任何对现状感到不满、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都可以标榜自己是“批判的”。但它们并不都属于“批判理论”,因为它们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只有批判的态度不能形成一种特定的理论派别。批判理论是一个很宽泛的思潮,它涵盖的领域包括文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它有很多流派,比如心理分析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新批判理论、结构主义批判理论、解构主义批判理论、新历史和文化批判理论、同性恋批判理论、非裔美国人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这些批判理论的分支虽然关注点各异,但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批判理论的关键特征是“批判”。在这里,“批判”的意思是“反思”,而不一定是“批评”,它是对某项标准的检视。“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时,我们在做文学评论;当我们检视我们的评论所依据的标准时,我们在做批判理论。”^①批判理论的理念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的这句经典名言成了它的有力武器。在如何看待民主方面,批判理论家抱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他们检视了当今主流的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反思其基础规则——多数原则,发现它越来越无法合理地表达民意,因此试图重新将“参与”引入政治运作中,用人与人之间理性、自

由和平等的交流挽救愈发僵化的代议制,构建一种以平等参与和理性交往为核心的合理性的民主模式。第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批判理论的指导原则。在马尔库塞看来,批判理论既保存了哲学的批判性和解放维度,又展示了一种能够实现的社会实践。因此,批判理论家不仅构建理论,而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作为批判理论分支的协商民主也不例外,随着它的成熟,批判理论家在网络平台、社会运动、日常生活、政府决策等领域试验、推广这一民主模式,这将有助于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完善。

批判理论的反思不仅是对代议制民主和协和民主等现有民主模式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协商民主理论本身的反思。具体而言,借用哈贝马斯对事实性与规范性的评论,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偏重规范构建,重视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第二代则持开放态度,兼顾规范性与事实性,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同时回应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第三代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规范研究为基础,更偏重事实性,提出了国际环境保护和由全球正义运动推动的公共协商的新模式。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讨论了一件协商式的实践范例了。它的主题是如何消除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协商的参与方是财政部、特里尔行政区、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会在送呈财政部和特里尔行政区的报告中统计了该地区近十年的总收入,这一数据显示葡萄种植业连年亏损,要求当局采取免除税收等措施扶助葡萄种植者。地政局局长兼税务稽查官在审核之后给出了以下意见:一、由于协会是由葡萄园主组成的,他们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隐瞒真情实况,因此报告书中的数据不可靠。二、葡萄种植者贫困的主因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挥霍”(即扩大种植规模)造成的。这显然否定了政府与该地区的贫困之间的联系,甚至否认了该地区的贫困状况。作为妥协,政府也推行了一些措施,如“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譬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5页。

马克思认为,这些措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第一种措施显然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①这一分析显露了该地区贫困的根源:现实与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该地区的官僚界普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高明,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超过对被管理者的信任;以前管理该地区的官员晋升后往往成为继任者的上司,改变现状意味着对权威发起挑战。这样一来,官方在协商中倾向于为现状辩护,加上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申辩,被管理者经常在协商中处于被动地位,所谓协商也流于形式。因此,变革政府管理模式是协商民主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此外,为了使私人愿望有效变成公共信念,需要引入第三种因素——媒体。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的产物,也是社会舆论制造者、传播者,“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②。虽然这个例子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马克思已经揭示了现代协商民主的两个必备要素:协商过程的参与者,尤其是官方和民众的意见必须得到同等的尊重和考虑;协商过程应该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如果不具备这两个要素,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批判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并且提炼出了协商民主的两大核心:平等参与和理性交往。他们在“参与”标签下对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展开了独特批判,在协商民主的定义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8页。

最有革新意义的是重视在界定公共善的对话过程中的“偏好”(preference)形成(或转变)。事实上,协商民主需要偏好在互动中进行转变。“通过这个过程,最初的偏好得以转变,以便把别人的观点考虑在内。”^①在此意义上,它不同于作为(外生的)偏好(或意见)聚合的代议制民主观念,它要取代后者的(民主)形构。

^① D. Mille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in 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olity Press, p. 75.

Pipan Lilun Shiyu Zhong De Nieshang Minzhu

MULU

目 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序 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续总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奠基 1

第一节 公共空间理论 1

第二节 对议会民主的反思 40

第三节 对协和民主的借鉴 27

第二章 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协商民主 37

第一节 民主的分类 37

第二节 公共领域理论 42

第三节 新三权分立 60

第三章 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与辩护 65

第一节 博曼的完全自由主义的协商民主 65

第二节 弗雷泽的正义—民主观 70

第三节 扬的深层民主构想 77

第四节 本哈比对协商民主的辩护和反思 86

第四章 协商民主理论的实际运用 93

第一节 国际环保机制中的协商民主 93

第二节 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协商民主 99

第三节 作为管理机制的协商民主 107

结 论 122

参考文献 127

后记 149

第一章

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奠基

第一节 公共空间理论

阿伦特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政治哲学家，尽管她自己并不认同“政治哲学家”这一称谓，但是，她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无法绕过的里程碑。阿伦特的理论体系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和对抗。围绕这个主题，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政治理论，尤其是当代民主理论的走向。在反思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阿伦特发现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重要性，因为公共空间培育和保存了人的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人们因为葆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才能以类似于希腊城邦式的协商方式处理政务。这些协商政治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协商的过程，民主协商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至高的政治自由。虽然公共空间是开放的，我们无法确定协商民主会把政治导向何种方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方向绝对不会是僵死的体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制。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空间是政治活力的源泉。阿伦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术语，但她的政治构思与协商民主是一致的。正是基